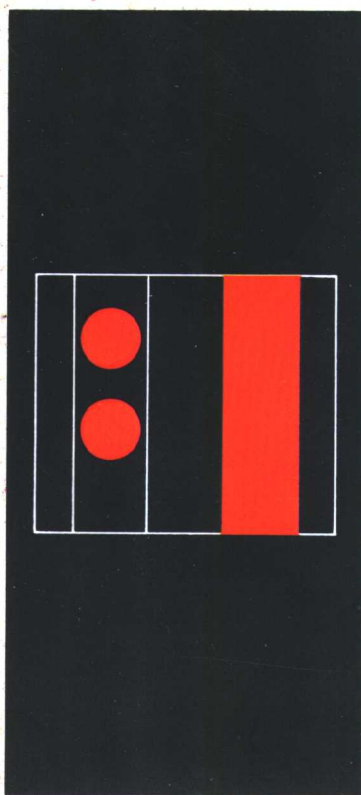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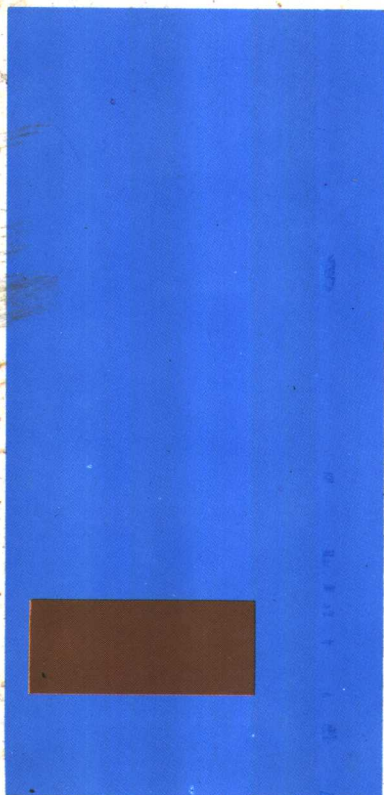


生与死的对抗

〔美〕诺尔曼·布朗 著



LIFE AGAINST DEATH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生与死的对抗

〔美〕诺尔曼·布朗 著
冯 川 伍厚恺 译
韦 铭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LIFE AGAINST DEATH

(黔)新登字 01 号

NORMAN O.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根据美国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吴家辛

装帧设计：曹琼德

技术设计：成 行

生与死的对抗

[美]诺尔曼·布朗 著

冯 川 伍厚恺 译

韦 铭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39 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323 千字

印数：5001—12000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21-03017-0/B·58 定价：15.80 元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主 编:陈维正(中国企业管理成都培训中心)

副主编:刘小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学)

陈维纲(美国哈佛大学)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昌(华南师范大学)

王馨钵(四川文艺出版社)

冯 川(四川大学)

安庆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刘 继(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阮 炜(深圳大学)

黄 平(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黄筑荣(贵州人民出版社)

蒋 庆(深圳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陈维正 黄筑荣

编者的话

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到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存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对人的宏观研究，即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侧面，如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的研究；一是对人的微观研究，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

为了帮助国内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了解现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潮，以便纵观全局，我们选编翻译了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进行微观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丛书出版。这些著作从各个领域的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并预测这种精神状态在未来的演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人的主体性研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交汇点，由此形成了哲学人类学、深层心理学、社会生物学、人类行为学等竞相争艳的纷繁格局；另一方面，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较客观地揭示了

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当然，由于作者固有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些著作中存在着一些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需要在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些著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为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编委会

1987年5月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author
Norman O. Brown and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谨向本书作者诺曼·布朗和新英
格兰大学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译者序

诺尔曼·布朗也许算不上本世纪的文化名人，然而他的著作《生与死的对抗》却一度发生广泛的影响并引起深刻的震荡。厄内斯特·贝克尔曾说：“如果几本至诚的书能够直接改变世界，那么刚才提及的5位作家可能就已经摇撼了各个民族的基础。”^①他所说的这5位作家是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奥托·兰克、诺尔曼·布朗和R·J·利夫顿。把布朗与弗洛伊德相提并论，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布朗的影响，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布朗的某些见解确实揭示了弗洛伊德未曾揭示的问题。

布朗写作此书的基本动机，是试图以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对全部人类历史或至少是西方文明史作一剖析，借以诊断当今社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的诊断使他发现：人是一种普遍患有神经症的动物；全部人类文化、人类历史以及种种社会制度，统统不过是神经症的产物；普遍的神经症使文明人永远处在受压抑的状态中，而由于始终得不到渴望得到的满足，人便像浮士德一样开始了不安宁、无休止的追求。这种追求成为历史的动力，它一方面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组织来完成对人的压抑并因而加剧了人的神经症；另一方面，它作为人在被压抑状态中的一种奋斗和挣扎，又揭示出人内在地具有渴求痊愈的要求并因而为人的解放指示了一条出路。布朗出于对现代社会的失望和不满，对文明及其

① 贝克尔：《反抗死亡》，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成果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抱着严肃而执着的态度，致力于探索未来的出路，但最终却走向对自由的、无压抑的生活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呼唤，甚至幻想人能够倒退回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或沉醉于未受文明污染的肉体快感。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便成了天才与谬误的产物，成了若干深刻思想和一种幼稚结论的奇妙结合。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这本书才得以广泛流行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本书第一部分，布朗首先指出：压抑这一概念是全部精神分析的奠基石，也是理解人性及其内在冲突，以及人类文明史的关键。“人是一种压抑自己的动物，是一种创造出文化或社会来压抑自己的动物。”^①“人优越于其他动物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患神经症，而他这种能够患神经症的能力，只不过是它能够创造和发展文化的另一种说法而已。”^②因此，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够患神经症并因而能够创造文明创造历史。所以如果要给人下一个定义，则不妨像尼采那样说“人是一种疾病”，或直接说“人是一种神经症动物”。

把人定义为神经症动物后，布朗进而把文化和历史理解为神经症的产物或神经症的症状。他指出，文化作为神经症的产物是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达成的妥协；由于这种妥协在基本性质上不能令人满意，受压抑的因素与行使压抑的因素便会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并继续制造出一连串的症状，这些症状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历史学家感到有必要以精神分析学来研究历史是由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有历史？”^③他对这一追问的回答是：历史过程是靠人渴望成为他所不是的东西的欲望（the

① 原书第9页。

② 原书第10页。

③ 原书第15页。

desire to become other than what he is)来撑持的。这种未被意识到的欲望表现为一种永不安宁永不停息的追求。人作为永不满足的动物证明了人天性中有不能从文化中得到满足的欲望。正是这种永恒的、始终不可能在历史中得到满足的欲望成为人类用来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人类却并未意识到这种永恒的欲望不可能从历史中获得满足。“人类今天仍在继续创造历史，却不曾自觉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事实上，人类今天的所作所为，似乎正在使自己更加不幸福不快乐，并且还把这种不幸福不快乐称之为进步。”^①

布朗指出，精神分析的任务就在于使人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使人们能够“走出无止境的‘进步’和无止境的浮士德式的不满足”，“像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那样从自己的历史中醒来”。^②这样才可望不再成为历史的奴隶，才可望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才可望去享受生活而不是去创造历史。

在本书第二部分，布朗进一步指出：受压抑的爱欲是人据以创造历史的动力；人的基本追求是为他的爱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却注定了不可能在历史进程中找到；人创造历史的动力来自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这欲望由于未被人意识到其真实性质而表现为不停地向前追求，但实际上它的内在趋向却是要返回过去即返回童年时代。“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压抑的……成人在从压抑性现实逃向梦和神经症的时候是在退回自己的童年，因为童年代表着压抑发生前的一个较为幸福的时期。”^③ 布朗曾引用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中的一段话说：

那种表现为……趋向更完美境界的永不疲倦的冲动，可

① 原书第16页。

② 原书第19页。

③ 原书第23页。

以很容易地理解为本能受到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压抑构成了人类文化中所有最宝贵的财富的基础。被压抑的本能从未停止过为求得完全的满足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完全满足旨在重复一种原始的满足经验，任何替代机制，任何升华作用，都将不足以消除这种受压抑的本能的持久不衰的紧张状态。

不断地向前追求使人愈来愈远离其原始的满足，其结果当然是进一步加剧人类的神经症；但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人在内心深处始终是按快乐原则行事的。布朗说：“弗洛伊德……是在断言，我们存在的终极本质在无意识中始终是秘密地忠实于快乐原则的。……两千年来，一种体系化制度化的努力一直在把人变成一种苦行禁欲的动物，然而人却始终是寻求快乐的动物。父母的管教约束、宗教对肉体快感的恫吓、哲学对理智生活的推崇，所有这一切仅仅在表面上使人变得驯顺；而在暗地里，在无意识中，人始终是不相信这一套的……人始终不相信这一套是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尝过生命树上的果实，他知道它的美好滋味，他永远忘不了它的美好滋味。”^①但尽管如此，渴望返回童年时代的愿望却难以付诸实现。在历史过程中，虽然人在内心深处始终渴望按快乐原则行事，但他却不得不一再向现实原则作出妥协，被迫放弃他对本能满足的追求而经由升华使自己的爱欲成为创造历史的动力。

布朗正确地看到，人牺牲快乐原则而屈服于现实原则，并非如某些弗洛伊德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外界的强大压力，相反毋宁说人内在地具有自我压抑的冲动。压抑作用并非从外部强加给人的，相反，人自己对自己行使压抑作用，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自我压抑的动物。

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根深蒂固的需要把人造成了自我压抑

① 原书第31页。

的动物呢？为什么人总是宁可压抑自己的爱欲也不愿使它得到完整的满足呢？在本书第三、第四部分中，布朗指出：人压抑自己的爱欲并使之升华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对死亡的逃避；人是无力接受死亡的动物；在生物学水平上，生本能与死本能是统一在一起的，快乐原则同时也就是涅槃原则，敢于生活同时即意味着敢于死亡；而在人身上，生与死的统一却由于人对死亡的逃避而破裂，由此便造成了生与死的对抗；致力于反抗死亡的人由于畏惧死亡而畏惧生存，他因此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爱欲（生本能）并使之向着虚幻满足的方向升华；这样，渴望回到过去的冲动，在压抑状态下便不自觉地成为“从未来中寻找过去”的冲动，人因而成为浮士德式的永不安宁地追新求异的动物。用布朗的话说，“人身上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统一一旦破裂，其结果就是使人成为历史性的动物。因为，永不安宁的快乐原则作为涅槃原则的病态体现，正是那使人成为浮士德式的人的动力，而浮士德式的人乃是创造历史的人。一旦压抑作用不复存在，浮士德式的人的永不安宁的追求便走到了尽头，此时他便会感到满足地说：‘停留一下吧，你多美呀！’”^①

显然，如果历史是生与死对抗的产物，那么，使人走出历史这场噩梦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建生与死的统一。事实上我们看到，布朗正是怀着结束生与死的对抗的愿望来写作《生与死的对抗》的。用布朗的话说，“生本能与死本能的重新统一只能被设想为历史过程的终结。”^②“如果涅槃原则属于死本能而快乐原则属于爱欲，那么它们的重新统一便将是一种生命的安宁状态，而这将是一种完满的、无压抑的生命状态，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我肯定的生命状态而不是一种自我改变的生命状态。这样解释的话，精神分析便重

① 原书第 91 页。

② 原书第 91 页。

新肯定了古老的宗教向往。”^① 布朗满怀热情地呼唤这种无压抑的生命状态，他说：“禀有浮士德性格的我们不可能正面想象‘安宁’、‘涅槃’、‘永恒’而只能把它们想象为一切活动的停止，换句话说，只能把它们想象为死亡。但我们的理论探索与其说是要寻求死而毋宁说是在寻求生，只不过这种生已经把生与死统一了起来。”^②

可见，布朗对“无压抑的生命状态”的向往，实际上是对一种宗教神秘主义境界的向往。基于这种向往，布朗不仅主张废除历史，对历史进行末日审判，而且主张取消时间，结束时间的暴虐统治。布朗说：“压抑作用……开创了历史的时间。压抑作用把没有时间性的本能重复冲动转变成向前运动的神经症辩证法，而这就是所谓历史；……相反地，那未受压抑的生命……却并不处在历史性的时间之中。”^③ 置身于历史与时间之外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它摆脱了时间的暴虐统治而逍遥于无所谓生死无所谓时间的自然状态或游戏状态中。这的确不愧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向往，我们甚至可以从其中辨认出庄子哲学的影响（布朗曾多次肯定道家的生命追求），而这种影响又是与基督教神秘主义（例如保罗的神秘主义思想、雅可布·波墨的神秘主义思想等）结合在一起的。布朗说：“未受压抑的生命是没有时间的或者说是永恒的。这样，精神分析学在把自己的逻辑结论贯彻到底……的时候，就再次把古老的宗教向往搜集到自身之中。永恒的安息日，那时间不再成为时间的时刻，就正是这一状态的描绘——而这一状态则正是无时间性的本我（Id）中强迫性重复冲动的终极目标。”^④ 在布朗看来，时间也如历史一样既是压抑作用的产物，又反过来作为一种压抑结构强化了对人的压抑。要摆脱压抑走向生与死的统一（无压抑的生命状态），要使人最终

① 原书第 90 页。

② 原书第 95 页。

③ 原书第 93 页。

④ 原书第 93 页。

在时间之外获得完全的满足,就必须像废除历史一样地废除时间。布朗说:“把时间予以取消的思想,对许多人包括对正统精神分析学家来说都不啻是荒唐无稽的胡言乱语……难道时间不是所有事物的本质吗?难道我们是天神以致竟可以随意废除时间吗?但是,时间并不是事物之本质。……(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使时间成为一个心理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它因此成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正像叔本华看到的那样,它开启了人的心灵从时间的暴虐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它暗示人的心灵一旦穿透现象的帷幕到达凭直观把握的实在,便会发现并不存在什么时间。”^①

布朗废除时间的思想也像他废除历史的思想一样,是为了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童年时代之所以始终令人向往,就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作用还没有来得及把时间焦虑和生命的紧张追求强加给试图逃避死亡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布朗可以说儿童生活于永恒中并享受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布朗引用精神分析学家马星·波纳帕特的话说:“童年时代似乎在某种意义上逍遥于时间之外。童年时代……对儿童来说似乎就是永恒。”^② 这些说法表明布朗对童年时代的向往是出于对永恒的向往;而人对永恒的向往,说穿了,却不过是人借以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这样,布朗便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反对逃避死亡,主张像拥抱生活一样地接受死亡;另一方面,他废除历史废除时间的主张,又恰恰是为了逃避死亡。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如果没有对死亡的反抗和拒斥,布朗又为什么不能像接受死亡一样地接受历史和时间的“暴虐统治”呢?

当然,进一步思考便会发现,布朗之所以不能接受死亡,乃是不能接受人类在仇恨中走向毁灭。他似乎更希望人在爱中坦然地

① 原书第 83—84 页。

② 原书第 94 页。

接受自己的死亡，而不要在压抑和仇恨中把自己的死亡本能转化为毁灭他人的冲动。历史已经太多地展示了人残杀自己同胞的嗜血倾向，因此，对历史的不能接受，本质上是对人的杀戮倾向的不能接受。在自然状态中，生与死的统一意味着生命冲动同时即是死亡冲动，从而爱欲的满足理应导致人坦然的、无怨无悔地接受自己的死亡；而在历史过程中，生与死的对抗却在压抑死本能的同时使死本能向外转化为一种针对他人的攻击性。在布朗看来，这种攻击性既是创造历史创造文化的动力，又是毁灭他人毁灭世界的威胁。换句话说，人是由于不能接受自己的死亡才通过压抑死亡本能而把死亡本能转变为对他人的攻击性和杀戮倾向的。布朗在本书绪言中指出：处在历史过程中的人，“由于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欲望并因而不能获得欲望的满足，已经变得仇恨生活和准备毁灭自己。”这里所说的“自己”，本来应该是指他人，但由于他人反过来也可以把自己作为他人来消灭，所以消灭他人和消灭自己实际是一回事。在本书结尾处，布朗引用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足》中的话说：“人类制服自然力的力量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凭借这些力量，他们现在已能够轻而易举地互相消灭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而唯一能够摆脱这种可怕前景的出路，似乎只能是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死亡，避免将自己的死亡本能转变为残杀他人的举动。

但是显然，在历史的结构中，布朗的这一幻想，也像他对于无压抑的生活的呼唤一样，乃是一种注定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或许正因为如此，布朗才错误地把爱欲的全面解放，把无压抑的肉体生活，把自由的童年游戏视为人类的未来出路，并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坚强得足以去生并因而坚强得足以去死”的未来超人的形象。他的这一荒谬结论无疑是本书的巨大缺陷，但另一方面，他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人类心灵的深刻剖析，却不乏某些惊人的见解并往往能给人以意义深远的启示。

作为一篇简短的译序，本文不可能完整勾画出原书的丰富思

想，甚至上述基本思想的概括也完全可能是偏颇甚或错误的。相信读者在批判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定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中获得某些积极的借鉴。

本书是伍厚恺先生和我共同翻译的。全书绪言和第一、二、三、四、六部分由我翻译，第五部分由伍厚恺先生翻译。囿于学识和水平，加以时间仓促，译文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尚望有识者不吝赐教。

冯 川

1992年1月于四川大学